

部落问题：阿富汗国家重构的 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

闫伟^{**} 刘伟^{***}

【内容提要】 部落社会是影响当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结构性变量，也是深刻认识阿富汗问题的关键性因素。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内聚力，这与阿富汗国家重构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前，部落社会对国家能力的拓展、合法性的增强造成严峻挑战。部落社会以血缘和特定地缘为认同中心，裂变为众多相互孤立并具有高度内聚力和排他性的认同单元，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认同和统一。阿富汗对部落社会治理的失败给予塔利班可乘之机。相较于政府而言，塔利班更加适应部落社会的组织形式、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部落社会成为其再次崛起的温床，影响社会和解。总体上看，阿富汗以西方为模板重构国家制度，这与阿富汗传统社会严重脱节。阿富汗部落社会在地方治理、公共产品供给、政权的合法化、冲突化解乃至抵御境外极端主义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 阿富汗 部落社会 国家构建 塔利班 社会和解

DOI: 10.16608/j.cnki.nyyj.2021.01.06

阿富汗问题产生已逾四十年，阿富汗重建也经历了二十年。2020年年初，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阿富汗总统加尼开启了第二个任期，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也出现了积极的信号。但是，阿富汗问题并未迎来真正转机，反而愈加严重，深刻影响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阿富汗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部落社会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62）的阶段成果。

^{**}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叙利亚研究中心教授

^{***}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内的极端组织就有 20 多个，其中不乏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 (ISIL-KP)、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 (IMU)、真主旅 (Jundullah)、伊斯兰军 (Lashkar-e-Islam)、虔诚军 (Lashkar-e-Taiba) 等跨国极端组织。^① 阿富汗也是周边国家及域外大国的博弈场。阿富汗问题持久难解，国家构建^② 的失败是直接的原因，美国甚至称阿富汗为“失败国家”。因此，破解阿富汗国家构建的谜题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阿富汗问题至关重要。

国内外学界从大国博弈、政治制度、毒品问题、政治伊斯兰、经济发展等多个维度对阿富汗国家构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③ 但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社会因素，特别是部落社会的影响。阿富汗的城市化率低下，目前城市化率只有 25% 左右，^④ 大部分民众生活在部落地区。学界主要关注的是阿富汗城市政治或者城市精英，但是农村尤其是部落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⑤ 换言之，能否妥善整合部落社会成为阿富汗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就是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德国学者策特尔 (Conrad Schetter) 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想要知道阿富汗人的真实想法，必须要到农村。”^⑥ 简言之，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为主体，被视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部落社会不仅是阿富汗最重要

^① “Afghanistan Security Situation: Country of Origin Information Report,” European Asylum Support Office (EASO), 2019, p. 32.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Afghanistan_security_situation_2019.pdf

^② 广义而言，国家构建 (state-building) 即构建现代国家的进程，大致包括建立统一的行政、司法、税收、军事体系和认同观念，确立中央权威。其中，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的关系是核心问题。

^③ James F. Dobbins, *After the Taliban: Nation-Building i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8); William Byrd, *Afghanistan: State Building, Sustaining Growth and Reducing Poverty*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5); Francis Fukuyama ed., *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Nik Hynek and Péter Marton,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Multinational Contributions to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黄民兴：《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刘泓：《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民族学视野中的阿富汗国家重建》，《民族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21~30 页；张吉军、汪金国：《“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政治稳定发展研判：国家治理的视角》，《南亚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43~158 页。

^④ UN, “Country Profiles: Afghanistan”. <https://population.un.org/wup/Country-Profiles/>

^⑤ Ali Banuazizi and Myron Weiner eds., *The State, Religion, and Ethnic Politics: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5.

^⑥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

的社会组织，而且还是政治认同的基本来源。由此塑造的部落政治文化深刻地影响了阿富汗人的行为方式。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开始关注阿富汗的地方政治。^① 这一问题也日益引起阿富汗政府乃至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视。但是，对于部落社会如何影响阿富汗重建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事实上，部落社会与国家构建的矛盾几乎贯穿于整个阿富汗近现代历史，成为审视阿富汗问题的结构性变量。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尝试对当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困境进行新的解读。

一、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特性及其与国家构建的内在矛盾

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亚非大陆上广泛存在的“分支型社会”（segmentary society）。^② 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沿着宗族的界限分裂为大小不一、相互独立和平等、互不统属的社会单元，相互之间矛盾重重。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构建存在结构性的矛盾。故此，对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深入分析则是拆解这一矛盾的前提。那么，对阿富汗部落社会真实图景的描绘便成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社会为主体，普什图人为跨界民族，主要跨居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阿富汗普什图人主要有两大部落联盟，即杜兰尼（Durrani）和吉尔查伊（Ghilzai）。^③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严密的谱系结构，所有部落及成员可以追溯至共同的祖先。当然，这种谱系关系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是却成为部落社会组织 and 认同的基础。经历了40余年的冲突之后，阿富汗部落社会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① 相关研究关注部落社会的基本特征、历史上部落社会与阿富汗政治发展的关系等，对于部落社会如何影响当代阿富汗重建的研究不够系统。See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钱雪梅：《普什图社会的政治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汪金国、王国顺：《论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部族症结》，《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8~24页；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部落社会治理及启示》，《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第106~129页。

^② “分支型社会”（Segmentary Society）也被译为“分节社会”或“裂变制世系群”等，最先由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提出，成为西方学界研究西亚和非洲传统部落社会的重要视角。参见 [英] E. E.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褚建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③ 卡兰里（Karlanri）和戈古斯特（Ghughusht）为另外两大部落联盟，分布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

第一，部落组织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平等性。相对而言，阿富汗部落社会长期维持着小土地所有制，形式上以部落或者村庄共有土地为主，实际上则以家庭或家族土地占有为基础。当家族首领去世后，土地将在三代直系亲属之间重新分配。此外，土地成为阿富汗部落社会身份的重要象征。^① 阿富汗人不会轻易变卖土地，使自己失去部落身份。这种小土地所有制在阿富汗得以长期保持。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深刻影响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结构。总体而言，阿富汗部落社会大致呈现出伞形的三级结构，即家族、村庄和部落。三者具有松散的血缘或认同联系，并非等级化和集权化的关系。家族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具有高度的内聚力，而家族之间、村庄之间以及部落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具有平等性，各自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② 因此，部落组织之间大都不存在相互隶属与依附的关系。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指出，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权力平衡存在于部落民之间，以及不同的部落组织之间。”^③ 部落民和部落组织都反对外部力量的干预，诸如收税、征兵、政治上的控制等。

第二，部落社会属于自组织型的社会。传统上，部落社会被视为无政府的社会，即超然于国家控制之外，是“法外之地”。西方学者将阿富汗部落社会视为霍布斯意义上的“无政府社会”，^④ 但是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无序社会。尽管自1747年阿富汗建国后国家从未对部落社会实现有效、直接的控制，但是大部分时间维持着间接统治。部落的首领汗（Khan）^⑤ 和村长马利克（Malik）事实上充当着国家与部落社会中间人的角色。他们既是国家在部落的代表，同时也是部落社会的公共权威。在这种情况下，部落社会也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权威结构，即部落首领、支尔格大会（Jirga，部落大会）和宗教人士。在部落社会中也具有传统的冲突化解机制，即普什图

^① [美] 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黄建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② 阿富汗部落的这一特性与阿拉伯贝都因部落十分相似，参见：[美] 托马斯·J. 巴菲尔德：《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杨张锋译），《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6~116页。

^③ Ernest Gellner, "Trib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09-110.

^④ John Braithwaite and Ali Wardak, "Crime and War in Afghanistan: Part I: The Hobbesian Solu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53, No. 2, 2013, pp. 184-187.

^⑤ 传统上，“汗”一词在阿富汗主要指部落首领和大地主，现在也用来指称村长。

瓦利（部落习惯法），其独立于国家世俗法和伊斯兰教法之外。这些是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社会制度。因此，阿富汗部落社会是一种自组织型的社会。

但是，常年的冲突也对部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部落首领在战乱中受到各派力量的打击，作为国家与地方的权力中介逐渐消亡，军阀和宗教人士相继取代部落首领成为地方权威的代表，成为所谓的“新汗”或者“伊斯兰汗”。^① 抗苏军事领袖马苏德指出：“军阀代替部落首领，力量更为强大。”^② 一些西方学者近年来在对阿富汗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村大量的部落首领和村长在内战期间被秘密处决或赶走。^③ 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破碎化和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威遭到严重削弱，公共产品的供给受限。而以家族和村庄为单位的部落社会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的角色，向地方提供安全和救助等公共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部落社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第三，部落社会具有极强的内聚力。阿富汗部落社会兼具行政、军事、安全、经济等多项职能。这使部落组织类似于“微型政府”，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部落成员平时的生产生活得到部落组织的扶持与帮助，在受到外部威胁时，部落为成员提供安全庇护。^④ 部落成员也承担一定的群体义务，对部落绝对忠诚，在部落遭受外部威胁时，敢于为部落牺牲等。部落组织也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这成为部落民最基本的社会认同。因此，部落民的生存高度依赖部落社会，一旦失去了部落组织的支持，其境遇将十分艰难。

阿富汗部落组织成为利益和认同的共同体。部落民的政治利益、价值取向、个人命运与部落组织休戚与共。部落的集体利益是部落民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部落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个人和家族的政治取向。政治认同也以部落组织为中心，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国家认同或意识形态认同则相对虚弱。故此，阿富汗部落社会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属

^① Antonio Giustozzi, *Empires of Mud: War and Warlords in Afghanistan*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9), p. 34.

^② Gilles Dorransoro, *Revolution Unending: Afghanistan, 1979 to Presen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5), p. 123.

^③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4-55, 58-59.

^④ M. Nazif Shahrani, “‘From Tribe to Umma’: Comments on the Dynamics of Identity in Muslim 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 No. 3, 1984, pp. 27-38.

于“内向型社会”。^①在这种背景下，部落组织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形成了类似于同心圆的认同结构。^②家族与家庭最具有凝聚力，家长具有绝对权威。村庄、部落、民族、教派和国家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则渐趋衰减。家族之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威，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但当遭遇外部力量的干预时，看似松散的部落社会又会沿着谱系联合为更大范围的共同体。

第四，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冲突型社会。英国人类学家普理查德在分析苏丹的努尔人时提出“平衡—对抗”理论（Balanced-Opposition），认为冲突在部落社会关系的维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不同组织通过相互的竞争和对抗，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独立地位。^③这也适用于阿富汗部落社会。不同的部落民、部落组织之间存在敌对关系，借此维系个人和部落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和平等性，使得部落社会充满了冲突。正如阿富汗的谚语所言：“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的堂兄，我、我的兄弟和堂兄一起反对外部世界。”^④

血缘和谱系关系在社会冲突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冲突双方根据谱系原则，拉拢其他血亲集团加入冲突，有时使小范围的冲突升级为泾渭分明的两个血亲集团的冲突，甚至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分裂与对抗。个人行为容易外溢为家族和部落的集体行为。^⑤但部落社会具有解决冲突的独特机制。一是以对等为原则的血亲复仇，“将法律和公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⑥复仇可能持续数代^⑦；二是部落会议（支尔格会议）、部落或宗教领袖的调

^① 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48-251.

^② Aidan Parkes, “Trials of the Past: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State Centralisation in Afghanistan,”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outh Asia*, Vol. 12, No. 2, 2018, pp. 149-159.

^③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译），第 169~199 页。

^④ 这句谚语也被用于形容阿拉伯贝都因部落。See Fredeik Barth, “Descent and Marriage Reconsidered,” in Jack Goody ed., *The Character of Ki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3.

^⑤ Nivi Manchanda, “Queering the Pashtun: Afghan Sexuality in the Homo-nationalist Imagina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1, 2015, pp. 130-146.

^⑥ Marie Castetter, “Taking Law into Their Own Hands: Unofficial and Illegal Sanctions by the Pakistan Tribal Councils,” *Indiana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 Vol. 13, No. 2, 2003, pp. 543-578.

^⑦ Emil Aslan Souleimanov and Huseyn Aliyev, “Blood Revenge and Violent Mobi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echen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2, 2015, pp. 158-180.

解。调解的目标不仅是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维持社会的平衡，冲突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部落组织的高度自治性。

上述特点勾勒出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整体风貌。简言之，部落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结构松散，具有自组织性。巴基斯坦普什图部落社会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在前现代，阿富汗国家与部落存在矛盾，但总体上处于共存和共生状态。国家依赖部落社会的效忠，部落社会则通过国家的庇护获得领地和分得战利品。国家成为部落社会的衍生品，借助部落首领对部落社会维持间接统治，没有权力征兵、征税以及施加统一的法律和行政体系。部落社会则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1747年，阿富汗建国后，杜兰尼王朝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然而，现代国家具有构建性，即在整個社会建立共同的法律、行政力量、财政和税收体系，以及公共文化的过程，并将地方的传统权力汇聚于中央政府。^①换言之，国家在整个社会行使主权。

阿富汗部落社会的高度自治性与现代国家的集权性由此形成结构性矛盾。现代国家更强调对于部落社会的整合和控制，以及构建超越家族、部落且更为稳定的国家认同。19世纪中期以来，阿富汗政府一直致力于削弱、甚至根除部落社会的自治性，打破部落社会传统权威与制度，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强大的部落社会而言，中央政府较为虚弱，无力从地方提取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资源，只能借助境外力量整合与控制部落社会。在此后近200年的历史中，阿富汗中央政府的权威只能达到地区层面（wuleswali），^②对于基层社会一直鞭长莫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苏联支持下的人民民主党（PADA）政权将部落社会视为“落后的封建力量”，^③试图纳入直接控制，非但未能成功，反而引发了部落力量的严重敌视。

阿富汗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矛盾并未随着塔利班政权的垮台和阿富汗重建的开启烟消云散。由于长年累月的战争，部落社会进一步破碎

^① 参见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② 阿富汗地方实行省（wilayat）和地区两级行政体系，地区之下就是具体的村庄。截至2018年，阿富汗有421个地区。对于阿富汗部落与国家关系的演变，See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pp. 23-37.

^③ Barnett R. Rubin, "Political Elites in Afghanistan: Rentier State Building, Rentier State Wrec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4, No. 1, 1992, p. 82.

化，国家的权威和力量进一步弱化。因此，阿富汗重建仍然需要面对这一结构性问题的挑战。需要指出，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部落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既是一个“部落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问题”，即近代以来国家构建大都受到“韦伯式”或“霍布斯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致使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出现了零和博弈。国家构建就是要完全整合传统社会，在“无政府社会”中建立秩序。由此逻辑出发，现代国家与传统部落社会必然发生冲突。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仍然是影响当前阿富汗局势的重要因素。

二、部落社会与阿富汗国家重构的互动

国家构建的核心是建立现代政治制度。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阿富汗开启新的国家构建进程，而重建国家制度则是面临的首要挑战。在新时代仍然要回答老问题，即如何整合部落社会，如何将之纳入国家的控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了阿富汗政治制度构建的进程，将西方政治制度移植到阿富汗。^① 它的逻辑起点仍然植根于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即西方国家的国家是现代的，而部落社会则代表着“落后”、“愚昧”，属于“非正式”的组织。^② 阿富汗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传统的道路上，即自上而下地整合部落社会。部落社会也深刻影响了阿富汗国家制度的重建。

（一）部落社会与阿富汗基层治理能力的强化

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水平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征。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③ 阿富汗属于典型的“强社会—弱国家”^④，相对于强大的部落社会而言，国家能力相对虚弱。无论是王朝统治、人民民主党政权，还是塔利班政权，都未能真正将部落社会纳入直接控制，干

^①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8.

^②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pp. 10-11.

^③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④ 参见 [美] 乔尔·S.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预防和治理地方事务的能力有限。

阿富汗开启了政治重建进程后，不仅重建了中央、省和地区三级政府，而且通过加强基层政权的能力以控制部落社会。2003年，阿富汗实施“国家巩固计划”（Afghan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me, NSP）^①，向社会基层尤其是部落社会渗透。这是阿富汗重建以来规模最大也是覆盖最广的发展计划。^②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全国的村庄设立“社区发展委员会”（CDC），旨在通过向村庄提供电力、水源、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提升女性地位，重建地方社会，强化政府的合法性和民主制度，提升社会的治理水平。该计划迄今已完成三期，扩展到4.2万个村庄，平均每1.474个村庄设有一个社区发展委员会。^③

社区发展委员会由地方民众选举产生，事实上就是乡村一级的基层政权，国际社会为之提供必要的资源。这也是自20世纪20年代阿马努拉政权、人民民主党政权之后，阿富汗再一次尝试将农村地区纳入直接控制。但是，这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传统制度形成严重的矛盾。社区发展委员会与支尔格会议（部落会议）存在竞争关系。前者代表国家并具有国际背景，设立的初衷就是削弱部落组织的自治性，打破部落地区的传统制度。在实践中，社区委员会通过吸纳乡村的青年人，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瓦解宗教人士、部落首领和部落会议的传统权威。这对于部落社会传统的自治性形成了强烈的挑战。除此之外，社区发展委员会倡导的世俗主义和提升女性地位等观念，以及浓厚的国外尤其是西方色彩也与部落社会的传统价值相悖。在这一保守的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私产”，宗教是重要的社会规范，反对外部干涉和入侵则是部落社会的共识。因此，阿富汗政府的上述举措再次触犯了部落社会的禁忌。

^① 该计划名义上由阿富汗乡村复兴与发展部（MRRD）负责，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予以援助，具体由8个阿富汗非政府组织和21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实施。Andrew Beath, Fotini Christia and Ruben Enikolopov, “The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me: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in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2, No. 4, 2015, p. 304.

^② World Bank, “NSP III Project Final ICR,” ARTF, 2017, p. 7. http://www.artf.af/images/uploads/Final_NSPIII_ICR_Public_disclosed_December_2017.pdf

^③ 村庄达到25个家庭的规模即需设立一个社区发展委员会。Alessandro Monsutti, “Local Power and Transnational Resource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Rural Rehabilitation in Afghanistan,” 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 Colloquium, March 2009, p. 20. <https://agrarianstudies.macmillan.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colloqpapers/21monsutti.pdf>

更重要的是，以社区发展委员会为代表的地方治理体系尽管拥有大量的外部资源，但其有效性相对缺失。社区发展委员会在提供水源和电力、提升女性地位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能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及改变阿富汗部落民对于基层政权的消极认知，也未取代部落传统的制度和权威。^①而且社区委员会还存在任人唯亲和腐败等问题，甚至某些委员会被地方军阀控制。^②这套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以西方制度为模板，强行嫁接在阿富汗的农村地区，其资源来自外国的援助，因此不对阿富汗政府与社会负责，并与部落社会存在距离。阿富汗村民和部落民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尤其是社会内部矛盾的解决上更多依赖的是传统组织而非社区发展委员会。如今，阿富汗80%的冲突和矛盾由地方的传统制度解决，^③政府的权威仍然只限于城市，^④在农村和部落地区鞭长莫及。长期以来，阿富汗部落社会的自治与国家集权化的矛盾在当下得以延续，而基层治理的失败为塔利班以及其他反政府组织的崛起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二）部落社会与阿富汗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存续的关键。当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合法化的危机。显然，无论是塔利班等反政府组织的尾大不掉，还是政府的虚弱，都与政治合法性的相对缺失存在相关性。然而，政治合法性本质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政治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和能力。”^⑤自1747年建国后，阿富汗的政治合法性与部落社会密切相关。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源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一致推举。穆罕默德查伊王朝、穆沙希班王朝^⑥大部分时间里都积极吸纳部落首领进入国家机构，通过多种手段维持部落社会的支持与效忠。甚至以极端宗教思想作为旗号的塔利班运动，也寻求普什图部落的支持，宗

^① Andrew Beath, Fotini Christia and Ruben Enikolopov, “The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me: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in Afghanistan,” pp. 315-316.

^② 美国学者莫塔扎什维利对于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定量研究。See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20-150.

^③ UNDP, *Afghanista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Islamabad: Army Press, 2007), p. 9.

^④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p. 25.

^⑤ [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聂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⑥ 这三个王朝前后相继，构成了从阿富汗建国直到1973年的君主制度的时代。

教反而处于次要地位。^①

2001年以来,阿富汗政府一直力图强化政治合法性。形式上看,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源于竞争性的选举。^②但阿富汗也试图从部落传统政治文化中获取认同资源。例如,通过传统的部落大会制度(支尔格大会)构建合法性。近代以来,阿富汗发生重大事件后,往往召开具有代表全社会的大支尔格会议(Loya Jirga),^③使整个社会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这是部落社会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即所有部落成员要达成一致。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阿富汗过渡政府为了赢得民众尤其是普什图人的支持,召开了两次大支尔格会议,即2002年的紧急大支尔格会议和2004年的制宪支尔格会议,试图在过渡政府的组建和制定新宪法等方面寻求社会共识,进而强化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此外,为了迎合传统的部落政治文化,阿富汗沿袭旧制,将议会的上下两院也分别冠之以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平民支尔格”(Wolesi Jirga)和“长老支尔格”(Meshrano Jirga)。阿富汗政府试图借此强化新政权的部落色彩,以便迎合部落的诉求。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出自阿富汗最为显赫的家族,即杜兰尼部落联盟—波波尔查伊部落—萨多查伊家族。该家族建立了阿富汗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即杜兰尼王朝。卡尔扎伊是波波尔查伊部落的首领。^④在阿富汗问题爆发之前,杜兰尼部落联盟一直垄断政权。卡尔扎伊穿着普什图传统长袍,将自己打造成传统部落社会首领的形象。

但这也仅是“旧瓶装新酒”,传统部落政治文化的外表所掩盖的是一套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后者并非源于部落社会,反而将之视为异己力量,两者具有深刻的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阿富汗的政治合法性。其一,“荣誉”在阿富汗部落社会至关重要,部落与国家的独立自主事关荣誉。阿富汗政府长期由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所扶持,存在大量北约驻

^① Hamid Wahed Alikuzai, *A Concis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in 25 Volumes* (Bloomington: Trafford Publishing, 2013), Vol. 1, p. 552.

^② Thomas Barfield, *Afghanista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72.

^③ 阿富汗1747年建国就是大支尔格会议的决定,在此后的260余年里,阿富汗共召开18次大支尔格会议。See Jalal Khan, *Afghanistan Jirga System* (Saarbrücken: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0), pp. 60-84.

^④ Thomas Barfield, *Afghanista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 289.

军，这使新政权无法摆脱西方傀儡的“污名”，^①合法性先天不足。其二，当前阿富汗政府的部落政策与传统部落文化相悖。阿富汗政府实行强总统制的集权体制，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地方官员，并在部落地区建立行政机构，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这便将部落社会推向国家的对立面。历史上，阿富汗集权政府都无法从部落社会获得合法性。^②其三，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国家与社会建立稳定联系，进而加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阿富汗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较弱，尽管也启动了“国家巩固计划”，但效果不彰。特别是，政府无力真正平息地方的反政府力量，不能为部落地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和公共服务。其四，对于部落社会而言，政府的正当性存疑。自2004年以来，阿富汗举行的四次总统大选都存在选举舞弊的争议，在地方选举中这一现象也层出不穷。^③另一方面，尽管阿富汗总统长期由普什图人把持，但以“北方联盟”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这使普什图部落社会仍然具有被边缘化的受害者情结。正如一位普什图人所言：少数民族得到了美元，我们得到的却是子弹。^④

长期以来，阿富汗政府以部落和宗教等传统文化观念作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央政府与部落等地方力量的矛盾成为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深层根源。^⑤多年的战乱使阿富汗社会愈加保守，部落和宗教等传统社会组织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当前阿富汗形式上以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与阿富汗的部落社会的传统认知相悖，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合法性危机。部落、宗教组织尤其是塔利班等反政府力量乘势而起，使国家的合法性进一步弱化。据2019年“亚洲基金会”进行的民意调查，58%的阿富汗人认为政府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农民对政府在基础设施、安全领域、就业和司法领域的表现感到失望。^⑥在缺乏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本性变革的

^① Thomas Barfiel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fghanistan,” Middle East Institute, April 19, 201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political-legitimacy-afghanistan>

^② Scott Gates and Kaushik Roy, *War and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Historical and 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5), p. 201.

^③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p. 27.

^④ Amy Chua, “Tribal World Group Identity Is All,”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4, 2018, p. 29.

^⑤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p. 23.

^⑥ Tabasum Akseer and John Rieger eds., *Afghanistan in 2019: A Survey of the Afghanistan People* (San Francisco: The Asia Foundation, 2019), pp. 35, 46.

背景下，西方国家力图将阿富汗的政治合法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① 竞争性选举并不能使阿富汗政权在部落社会中合法化，反而可能酝酿着合法性危机。

总之，部落社会事实上成为影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重要变量，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冲突。其深层原因在于：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四十余年的战乱进一步加强了部落社会的重要性。相对于部落社会而言，阿富汗当前的国家制度却是新生的事物，是以西方模式构建的一整套政治体系，游离于部落社会之外。两者的冲突在于结构性的不协调和相互脱节。理论上讲，国家具有一定超脱于部落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但根本上仍然需要在传统社会尤其是部落社会的语境下进行构建。

三、部落社会与阿富汗国家认同构建的困境

社会认同是文化现象，现代社会大都具有多样化的认同观念。阿富汗社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族群、宗教构成复杂多样，社会认同多样化的现象在近代以来一直存在。^② 长期以来，不同的社会认同具有零和的关系和碎片化的特征。从家族、村庄、部落、部落联盟、族群、教派和国家，社会认同形成了同心圆的结构。总体上看，认同观念呈“U”型分布：宗教和地方性认同强大，处于两者之间的国家认同虚弱。四十余年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地方认同更加强大。其中，部落和地方性的血缘认同观念显然成为制约国家认同强化的关键因素。阿富汗部落认同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政治上部落民认同于家族、村庄和部落组织，个体与部落组织休戚与共，进而形成了具有高度内聚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二是在文化上认同于普什图瓦利（部落习惯法）、支尔格大会、传统文化观念、行为方式和制度模式。

当前阿富汗的国家构建不仅是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的重建，同样还是社会认同和国家情感的重建，弥合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分裂。因此，如何

^① 马克斯·韦伯将国家的合法性分为：魅力型、传统型和现代型。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9年版，第206~208页。

^② Olga Ladygina, "Features of Identity of the Population of Afghanistan," SHS Web of Conferences, Vol. 50, 2018, p. 2. https://www.shs-conferences.org/articles/shsconf/pdf/2018/11/shsconf_cildi_ah2018_01236.pdf

将松散的部落、族群、宗教认同汇聚于国家层面，增强国家的内聚力，推进社会和解，成为阿富汗面临的严峻挑战。阿富汗政府在整合部落社会认同上存在“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层面仍然强调国家认同与部落认同的契合性，以及部落认同的重要性，以便提升民众对于阿富汗政权的认同。诚如前述，阿富汗多次召开大支尔格大会，以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支尔格”命名国民议会。同时，在阿富汗2004年宪法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阿富汗是一个团结和不可分割的国家，它属于在该土地上的所有部落和人民，所有的部落和家族平等，以及国歌中体现各个部落等内容。^① 卡尔扎伊执政时期，依赖部落认同加强自己的地位，多次召开部落会议，召集部落首领进行商讨。^② 另一方面，阿富汗又不遗余力地削弱部落认同，加强国家认同。阿富汗政府采取身份登记制度，为部落民在内的所有人提供身份证，以加强国家身份认同。阿富汗政府宣扬抗苏英雄马苏德和阿富汗历史上著名的君王，提升阿富汗人的团结和荣誉感。同时，阿富汗总统加尼反对在官方活动中将他的部落称谓作为名字的后缀，以示作为国家领导人要超越部落认同，体现出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团结。^③ 在中央政府对各部部长的介绍中，除去部落和族群身份。

阿富汗在整合部落认同方面存在两难的困境：即强化国家认同势必削弱部落社会的认同，但阿富汗政府又需要从传统部落文化和认同中寻求合法性、强化国家认同观念。两者是零和的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源于现代国家构建与传统部落社会的内在矛盾。历史上，国家是部落社会的延伸，王室本身来自特定的部落集团，部落社会是王权统治的社会基础，部落政治文化则成为基本的政治规范。因此，国家认同和部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共存和共生。但是，在阿富汗当前的重建中，国家构建以西方制度作为模板，将部落认同视为地方割据观念，使国家认同与部落认同产生激烈冲突。

^① Afghanistan's Constitution of 2004.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Afghanistan_2004.pdf?lang=en

^② Golnar Motevalli, "Karzai Rallies Tribes, Distances Self from West," April 5, 201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fghanistan-kandahar/karzai-rallies-tribes-distances-self-from-west-idUSTRE6330ZJ20100404>

^③ 阿富汗总统加尼属于吉尔查伊部落联盟的艾哈迈德查伊部落 (Ahmadzai)，普什图人习惯将自己所属的部落名称置于姓名之后，以便体现自己的身份。Ankit Panda, "Afghanistan's New President Just Made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Gesture," *The Diplomat*, November 4,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11/afghanistans-new-president-just-made-a-small-but-significant-gesture/>

这种冲突体现在如下两个层次：第一，部落认同以特定血缘和地域为基础，现代国家认同则以意识形态为导向。^① 阿富汗传统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大都源于部落认同。阿富汗人使用“Qaum”一词指称家族、部落、族群、教派等传统组织。阿富汗人认为，这些组织具有相似性，主要以血缘或者地缘关系为基础，它们的区别在于规模不同。^② 因此，部落认同成为阿富汗传统社会认同的原型，传统的国家认同观念也受此影响。现代国家认同以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为基础，强调政治性。阿富汗部落社会关注地方认同和个体利益，对于意识形态具有免疫力。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对此指出：“阿富汗政治中的机会主义可以瓦解其他任何‘主义’。”^③ 第二，部落认同的狭隘性与现代国家认同超越性的矛盾。部落社会的认同观念具有排他性，兄弟、家族、村庄、部落、族群之间存在认同的鸿沟。这使阿富汗社会认同分裂为相互割裂和封闭的认同单元，具有马赛克化的特征。现代国家认同超越了特定的地域和血缘关系，将分散的社会认同汇聚于整个国家的范畴，强调的是公民的认同。第三，从价值取向上看，阿富汗部落认同的分权性与国家认同的集权性的矛盾。长期以来，阿富汗部落社会将分权、自治、平等视为基本的价值观念。^④ 自治和自由是阿富汗部落社会荣誉的关键，如果部落民或者部落组织失去了自由和自治，就意味着失去了荣誉，那么也就丧失了部落身份。然而，国家认同强调的是等级制、集权性。因此，阿富汗部落认同与当前的国家认同存在矛盾，进而深刻地影响阿富汗的社会政治发展。

其一，两种认同互不兼容，部落认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而国家认同则长期虚弱。阿富汗一位部落首领指出：我首先认同于我的部落，其次则是我的族群，最后才认同于国家。^⑤ 部落成为部落民心目中的“本我”，而国家则成了与之关系不大的“他者”。对于部落民而言，政府不过是一栋

① Ali Reza Yunespour, *Identity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Afghanistan*,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1, p. 3. <https://ses.library.usyd.edu.au/bitstream/handle/2123/8263/Ali%20Yunespour.pdf?sequence=1&isAllowed=y>

②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p. 15.

③ Thomas Barfield, *Afghanista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 253.

④ Akbar Ahmed, *The Thistle and the Drone: How America's War on Terror Became a Global War on Tribal Isla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p. 5.

⑤ Ankit Panda, "Afghanistan's New President Just Made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Gesture".

建筑，离开之后政府就不存在了。^① 部落民的国家观念也较为淡漠，更多认同于所属部落、族群或生活的地域，而并非国家。这削弱了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整合社会和从社会提取资源的能力，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失衡、疏离，社会愈强国家愈弱。

其二，阿富汗当前的竞争性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功能。对于西方而言，竞争性的民主的基础是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和发达的公民社会，这与阿富汗的传统社会南辕北辙。美国将阿富汗视为“民主改造”的模板，将西方民主制度嫁接到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土壤中，生成了一种畸形的选举政治。部落认同具有高度内聚力，部落民只认同于部落组织。在选举过程中，部落归属成为最重要的依据。卡尔扎伊和加尼在竞选中都突出自己的部落身份，加强对部落民的吸引和动员。地方议会的选举更是如此，部落首领更容易当选，成为地方统治者。^② 这些部落首领借助部落认同重新在基层社会建立侍从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的政权。

其三，阿富汗的部落认同成为其他传统认同观念的原型，也是阿富汗社会政治分裂性和对抗性的观念之源。历史上，部落认同是阿富汗社会政治认同的基础。^③ 部落认同延伸到整个社会就是对不同族群、教派乃至政党和政治派别认同。^④ 同时，沿着这些或明或暗的认同界限，整个阿富汗社会政治呈现出分裂性的特征。部落的对抗也外化为家族、教派和不同地区之间的隔阂。但是，在遭遇共同的外部威胁时，部落组织又会沿着共有的认同观念实现联合。比如，两个部落之间相互敌对，但面对其他族群或教派的威胁时又会临时联合起来。这种独特的认同观念成为阿富汗社会政治中无法回避的话题。

对于阿富汗而言，社会认同不仅是文化和心理现象，更是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的核心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工具理性”。身份认同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权力与地位象征。从总体上看，阿富汗显现出部落和地方认同强大，国家认同虚弱的现象。这是长期以来

^① Thomas Barfield, *Afghanista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 221.

^② 一些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个案研究，参见 Noah Coburn, *Parliamentarians an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Elections and Instability II*,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2010, pp. 11-12.

^③ Ali Reza Yunespour, *Identity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Afghanistan*, pp. 23-28.

^④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阿富汗，在其他伊斯兰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See Philip Carl Salzman,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8), pp. 11-12.

强社会—弱国家的逻辑使然。在阿富汗国家无法向部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的背景下，部落社会取而代之履行着相关的职能，这构成了部落认同的现实基础。在经历了四十余年战乱的背景下，国家与部落认同的失衡现象进一步凸显，并成为影响当前阿富汗问题的重要因素。^①

四、部落社会、塔利班与阿富汗冲突的内在关联

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冲突型”社会，部落组织不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单位，甚至还是军事组织。不同部落组织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和自治状态而相互对抗。部落社会内部琐碎的矛盾也有可能因独特的认同观念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因此，阿富汗部落社会在历史上就存在社会安全的问题。但这种冲突也并非完全没有限制，部落社会内部存在传统的冲突化解机制。历史上，部落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国家未能供给的安全保障。然而，阿富汗长年累月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部落社会的竞争关系，使社会内部的冲突更加频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塔利班运动等反政府武装在部落社会的渗透，使部落与当前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与社会和解问题高度关联。可以说，部落社会已成为影响阿富汗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变量。

塔利班的崛起是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最大的威胁。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统计，2019年阿富汗有10392名平民遇袭伤亡，其中47%与阿富汗塔利班有关。^②塔利班的东山再起与部落社会密切相关。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有三个支柱：即部落首领（长老）、支尔格大会和毛拉，三者相互制衡，毛拉和部落首领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③然而，阿富汗多年的战乱也使这一传统权力结构开始解体。部落首领受到沉重打击并开始消亡，军阀取而代之。毛拉阶层则作为穆贾希丁开始崛起，有的毛拉成为地方军阀，出现所谓的“伊斯兰汗”。塔利班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

^① Ali Reza Yunespour, *Identity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Afghanistan*, pp. 58-59.

^② 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L-KP）占12%，阿富汗安全部队占16%，国外驻军占8%。See UNAMA, “Afghanistan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Armed Conflict 2019,” Kabul, February 2019, pp. 5, 10. 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afghanistan_protection_of_civilians_annual_report_2019.pdf

^③ 相关讨论参见：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pp. 68-85.

起的。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运动在部落社会失序、普什图人失势的背景下兴起。其成员大多具有部落背景，谙熟部落社会的运行规则和政治文化，因此填补了当时部落社会的权力真空。其早期领导人皆出自普什图部落，为村庄的毛拉。^①塔利班当政后，对部落社会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适应部落社会的政治环境，拉拢一些部落首领；另一方面动员部落社会中的毛拉，使其成为塔利班伸向部落社会的触角。^②因此，传统的毛拉逐渐在部落社会中掌权。塔利班迎合了部落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使部落社会实现了稳定。

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部落社会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逐渐恢复了传统的三极的权力格局。支尔格大会得以重建，由部落民选出首领，在有些部落中军阀充当着部落首领。但是，随着塔利班的重组，部落社会成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角逐的对象，部落社会的权力关系面临重新洗牌。阿富汗政府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其原因在于：一是阿富汗政治体系高度集权，与部落社会的分权自治传统不符；二是在部落民看来，阿富汗政府具有西方“傀儡”的色彩，普什图部落对少数民族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较为反感；三是阿富汗政府在部落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地方安全形势恶化、公共服务缺乏。如今，阿富汗政府对部落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依赖侍从体系，即通过扶植某些部落首领来抵制塔利班的渗透。

相较而言，塔利班本身来自于部落社会，因此更适应部落的政治文化，在部落社会的渗透更加成功。其主要手段有：一是利用农村的毛拉招募部落中的青年加入塔利班；二是利用一些部落对于塔利班的恐惧，进而与之签订协议以换取对塔利班的支持与合作；三是借助宗教的旗号，积极调解部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扩大在部落社会的影响力；四是唤起部落民对阿富汗政府和西方驻军的愤恨，加强塔利班的合法性；五是在部落地区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甚至通过毒品生产和贸易改善部落的经济状况。^③此外，塔利班以普什图人为主，以反对少数民族对政权的控制为口号，进行社会动员。阿富

^① 塔利班最初的28名领导人中14人来自吉尔查伊部落联盟、7人来自杜兰尼部落联盟，只有1人为非普什图人。See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52-255.

^②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pp. 80-81.

^③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pp. 86-88.

汗政府与部落社会仍然处于相互隔离状态，而塔利班则深度融入部落社会。

正因如此，塔利班迎合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诉求和政治文化，填补部落地区的权力真空，并在阿富汗迅速扩张。据“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办公室”（SIGAR）估计，2019年6月，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14.5%的地区，29.2%的地区处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争夺之中，^①武装力量达到了6万。^②当前塔利班的领导权集中于“奎达舒拉”^③，但其组织结构松散，类似于“伞形”的结构，^④每个地区都具有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网络，与阿富汗部落组织结构和文化高度契合。塔利班基层的人员寓兵于农。由于阿富汗部落对于外省人持怀疑态度，80%~90%的塔利班武装人员集中在所属的部落组织活动。^⑤塔利班甚至要求成员的活动不能越过他们所属的部落组织。塔利班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农闲的春季和夏季，出现了所谓的“春季攻势”。另一方面，尽管塔利班强调保守的宗教认同，试图超越特定的族群与部落，但现实中领导层大都具有部落背景，未能摆脱传统的部落认同。当前的塔利班也存在坎大哈和帕克提亚两大派别，分别代表阿富汗普什图的两大部落联盟，即杜兰尼和吉尔查伊。^⑥两者具有一定的竞争性。而其他的部落联盟则基本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

塔利班以保守的宗教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但在组织、观念等方面并未真正超脱于部落社会的藩篱，而且两者还存在一定的融合。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塔利班的底层和外围，受到部落社会的影响越大，宗教意识形态的

^① Alia Chughtai, “Afghanistan: Who Controls What,” Aljazeera, June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6/24/afghanistan-who-controls-what>

^② Clayton Thomas, “Afghanistan: Background and U. S. Policy in Brief,” CRS Report, November 2020, p. 1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122>

^③ 因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而得名，也被称为“拉巴里舒拉”（Rahbari Shura）。See Abubakar Siddique, “The Quetta Shura: Understanding the Afghan Taliban’s Leadership,” *Terrorism Monitor*, Vol. 12, No. 4, 201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quetta-shura-understanding-the-afghan-talibans-leadership/>

^④ 哈卡尼网络也被视为塔利班之下的一个自治性的反政府组织。See Jeffrey A. Dressler, “The Haqqani Network: From Pakistan to Afghanist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October 2010, p. 2.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Haqqani_Network_0.pdf

^⑤ 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13.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2/10/20100624TR-HowTribalAretheTaleban-FINAL.pdf>

^⑥ Shahzad Bashir and Robert D. Crews eds., *Under the Drones: Modern Lives in the Afghanistan-Pakistan Borderland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7.

影响越弱。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的穆贾希丁具有一定相似性。^① 故此，塔利班运动更像是一场松散并与传统部落和地方力量相结合的社会政治运动，并不完全由宗教意识形态驱使。它要比当前的阿富汗政府更适应部落社会，部落社会则成为塔利班东山再起的社会基础。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中心与外围、城市与部落、精英与草根对抗的色彩。

由于阿富汗社会以农村和部落社会为主体，城市化率只有约 25%，^② 阿富汗政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部落社会的支持。塔利班不仅对阿富汗的安全形势造成威胁，更是在某种意义上挑战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当然，阿富汗部落社会也非完全铁板一块，仍有一些部落甚至是普什图部落反对塔利班。塔利班将对政府不满的青年人和宗教人士作为动员目标，这削弱了部落社会传统权威的影响力，与部落首领和长老存在矛盾。^③ 阿富汗西南部一些省份向部落民兵 (arbakai)^④ 提供资助，利用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抵制塔利班的渗透。

当前，单纯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几乎已成为共识。社会和解则是解决阿富汗冲突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⑤ 阿富汗的社会和解与部落社会息息相关。部落社会存在严重的内部对立，一直是阿富汗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如前所述，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冲突型”社会，即便在阿富汗冲突爆发之前，部落社会的内在冲突也从未断绝。^⑥ 小型冲突往往沿

① 比如，都是由宗教动员，领导层位于巴基斯坦，基层组织受到部落的影响，等等。

② UN, “Country Profiles: Afghanistan”.

③ Conrad Schetter ed., *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Order*, pp. 92-93.

④ 不同地区的部落民兵称谓有所不同，在坎大哈称为“Paltanai”，在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区部落地区 (FATA) 则称为“Salwishti”。部落民兵长期在普什图部落社会存在，具有复杂的选拔程序，没有报酬，不受政府控制。See Susanne Schmeidl and Masood Karokhail,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in ‘Community-Based Polic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 Arbakai (Tribal Police) in South-Eastern Afghanista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0, No. 2, 2009, p. 327.

⑤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军事手段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作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基础，忽视了社会和解，只是近年来才有所重视。2018 年，美国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更名为“阿富汗和解特别代表” (SRAR)。参见闫伟：《国际安全合作视域下的阿富汗安全重建》，《南亚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60~63 页。

⑥ Avideh Kobra Mayville, *Transforming a Culture of Violence into a Culture of Peace: Pashtunwali as the Basi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Master 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2011, p. 35. <https://dra.american.edu/islandora/object/thesesdissertations%253A2916>

着血缘和谱系的关系被放大为两大部落群体之间的冲突。部落社会是阿富汗传统社会的原型，其分裂性和冲突型文化又会衍生到整个社会，教派之间、族群之间的对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文化的延伸。多年的战争导致枪械在社会上广泛散布，地方性的武装和军阀崛起，国家则进一步弱化，致使社会秩序趋于崩溃。不同的组织假借部落、族群观念进行社会招募与动员，使阿富汗社会冲突进一步加剧。但另一方面，阿富汗也具有化解冲突的传统部落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普什图瓦利和支尔格大会。它强调矛盾解决中各方必须达成一致，同时关注于冲突各方的力量平衡，宗教在其中发挥着辅助的作用。

部落社会是影响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和社会和解的关键变量。部落社会隐含着冲突的因子，它可以放大社会冲突，但也具有独特和有效的化解之道。这同样也是当前社会和解的润滑剂。部落社会还是抵御域外极端组织渗透和扩张的防火墙。近年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扩张。与塔利班所不同，呼罗珊分支属于域外力量，其目标是国际性的，社会基础既包括城市中受到极端思想影响的青年，也包括农村的一些极端分子。尽管该组织主要活动在普什图地区，但也受到其他民族极端分子的青睐。比如，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就声称向呼罗珊分支效忠。因此，呼罗珊分支与塔利班在部落社会存在激烈竞争，双方爆发多次激烈武装冲突。但总体而言，塔利班运动是阿富汗本土尤其是地方化的政治军事势力，其诉求与部落社会基本吻合。而呼罗珊分支在部落社会没有真正的基础。这也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①

总之，在阿富汗仍然受到传统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的当下，国家自上而下整合部落社会效果不彰，反而会引发部落社会的抵制，最终为塔利班渔利。^② 正如一位部落首领所言：“政府在不断变换，但我们的体系不变，政府很难改变我们的体系。”^③ 阿富汗政府如何在与塔利班的博弈中争取部落

^① 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IMU）、真主旅（Jundullah）和伊斯兰军（Lashkar-e-Islam）等极端组织在阿富汗难以做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因为这些域外的组织无法在阿富汗社会尤其是部落中获得支持。

^② 当前，美国一些学者也意识到部落社会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重要性。See Ruhullah Khapalwak and David Rohde, “A Look at America’s New Hope: The Afghan Tribes,” *The New York Times*, Jun. 30,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01/31/weekinreview/13rohde.html>

^③ Avidh Kobra Mayville, *Transforming a Culture of Violence into a Culture of Peace: Pashtunwali as the Basi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83.

社会的支持，如何利用传统机制化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解，可能是解决阿富汗安全问题的重要选项。

结 语

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独特性，属于所谓的“分支型社会”，在政治观念和社会组织上高度分裂，同时具有追求自治、自由和家族政治的传统。部落社会就是由众多互不统属、相互独立和敌对的血缘或地缘群体聚合而成。近代以来，伴随着阿富汗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部落问题也因此凸显，并成为影响阿富汗历史发展与当前变局的结构性变量。这一问题的深层症结在于现代国家的集权性与部落社会的自治性之间的矛盾。部落问题同样也是国家的问题。历史上，阿富汗政府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几乎所有的集权化努力都遭到部落社会的反对，最终以失败甚至政权垮台而告终。长期以来，阿富汗政府在税收上并不依赖部落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外部援助。阿富汗也成为“地租型国家”，借此维持国家发展与部落自治的微妙平衡。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问题产生后，国家与部落进一步渐行渐远。尽管部落社会也受到冲击，但仍然延续下来，并成为部落地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供给者，国家的力量与合法性则进一步衰退。

2001年之后阿富汗开启了国家重构进程，但仍然要面对如何整合部落社会的历史命题。能否对部落社会实现有效的控制与整合成为决定阿富汗重建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部落社会高度的分权、自治严重阻碍了国家的集权化进程，使国家能力无法拓展到部落地区，也无法从社会中提取更多的资源，对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形成挑战。部落认同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基础，具有高度内聚力和狭隘性，这与国家认同的超越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形成尖锐冲突。以部落认同为基础的部落意识延伸到整个社会，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认同感的提升。部落社会同样对当前阿富汗的安全重建产生重要影响。它是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后者的组织原则和行为方式与部落政治文化相吻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部落社会的权力真空。部落社会作为一种“冲突型”社会，也深刻影响阿富汗的社会和解。

普什图部落社会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博弈的焦点。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下，阿富汗未能在重建之初借塔利班溃败的机遇整合部落社会，反而引发了塔利班的持续性抵抗。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部落社会的争夺中处于劣势，

最终使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而塔利班则借势而起，某种意义上成为部落地区的代言人。当前，阿富汗政府能力较弱，塔利班乃至其他地方势力强势崛起。这与阿富汗政府对部落社会整合的失败具有直接的关系。

从深层而言，部落社会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部落社会是阿富汗国家构建的桎梏。按此逻辑，国家构建就是将现代国家的制度、法律和安全触角伸向社会，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对于阿富汗而言，这套国家构建逻辑在部落社会中缺乏必要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国家很大程度上没有相应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如今，阿富汗仍然没有摆脱“地租型国家”的宿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外部世界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板，试图通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进国家构建效果不彰，并引发了阿富汗社会尤其是部落社会严重的抵制。部落社会并非完全消极，传统的部落制度可以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也可使阿富汗政权合法化，还可以解决地方矛盾和冲突，抵制境外极端势力的渗透。因此，对于当前的阿富汗而言，传统的部落制度与现代国家制度具有互补的一面，不完全是冲突。如何利用传统制度实现政治与社会和解，进而构建稳定的政治秩序，可能是当下阿富汗国家构建的着力点。

(编辑 毛悦)

political party, it maint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ocial movement, never really moderating its behavior.

KEY WORDS: Social Movements; Principal-Agent; Movement-Based Political Parties; Bharatiya Janata Party;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Nuclear Parity and Conventional Military Conflict in India-Pakistan Relations

By Hu Gaochen, He Hongmei & Tu Huazhong

ABSTRACT: Since their respective nuclear tests and emergence as nuclear states in 1998, India and Pakistan have routinely engaged in conventional military conflict. This makes them the only dyad of states on the planet with nuclear capabilities that regularly face off in conventional warfare. Based on their reading of India's nuclear policy, scholars of strategic studies are not able to us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clear parity and conventional warfare to explain why two nuclear states of Pakistan and India repeatedly face off in conventional warfare. In reality, the reason that India and Pakistan still engage in conventional warfare despite having achieved nuclear parity is that the two states maintain a nuclear "red zone", i. e. , a redline for using nuclear weapons. Territorial disputes cause military conflict to break out regularly between the two states, but within the nuclear "red zone" the two states control the intensity of the conflict and prevent an escalation beyond conventional warfare. That said, it is difficult to ensure effective and rational control of crisis situations given the confrontational nature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s such, prospects for violent conflict in South Asia, and even an escalation to nuclear conflict remain. Consider the region's complex geo-strategic, territorial and nationalistic challenges, it is critical that South Asia effectively manage and control crises.

KEY WORDS: India; Pakistan; Nuclear Parity; Conventional Conflict; Nuclear Conflict "Red Zone"

Afghanistan's Challenges: The Pitfalls of State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risis

By Yan Wei & Liu Wei

ABSTRACT: Tribal society is a structural variable that impacts Afghanistan's state building efforts and is critic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re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s. Afghanistan's tribal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level of autonomy and cohesion, which are sharply at odds with the thrust of the reconstruction efforts of the Afghan State. At present, tribal society presents a strong challenge to the extension of state power and legitimacy. Tribal society is based on bloodlines and unique geography and is fragmented into many isolated lineage units that are highly cohesive and extremely exclusive, greatly limiting concept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unity. Afghanistan's failure to govern a tribal society has provided the Taliban with another opportunity. Compared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Taliban is more adaptive to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and behavioral modalities of a tribal society. As such Afghanistan's tribal society has become a hotbed for the Taliban's re-emergence,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cohesion. Generally speaking, Afghanistan attempted to apply Western models of the state to rebuild its national institutions, breaking deeply from Afghan social traditions. The reality is that Afghanistan's tribal society has its own unique values with respect to local governance,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e legitimacy of state power,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even combating foreign extremism.

KEY WORDS: Afghanistan; Tribal Society; State Building; Taliban; Social Reconciliation

**Hedging Strategies of Southeast Asian States towards China:
Is Myanmar an Exception?**

Peng Ni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sserts that small and medium sized states determine their hedg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y face, their perception of external threats or risks, and the strategic preferences of leaders. Myanmar has long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US-China economic competition, which is increasingly transitioning into security competition. As such, Myanmar enjoys considerable space to strategically hedg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Myanmar's geographic position vis-à-vis China, the shar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ontentious relations, and Myanmar's dependence on China mean that it faces a high